



全面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

曹雪涛

核心阅读

青年时期是科学家最具创新力的黄金时段，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能否促进青年科学家群体释放创新潜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科技竞争的胜负和民族发展的未来。

要重点支持和鼓励植根中国文化沃土中的原始性、独创性的学术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创新体系。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加强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原始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创新的基础条件和整体环境明显改善，优秀人才和成果不断涌现，但“人多而不优、量大而不强”，开创性、革命性、颠覆性成果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源于本土并引领国际科技发展的原创性学术思想和技术体系还不完善，基础领域的世界级研究平台相对匮乏，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因此，高校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在我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把基础研究和原始创

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重大原创性理论和颠覆性技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格局，为建设科技强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基础研究是实现原始创新的重要载体。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体系的源头，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高校要更加自觉主动地强化“从0到1”的原创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基地（平台），提高承担重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的比重，有重点地部署瞄准世界学术前沿的长线研究项目，并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科学合作计划。党和政府应鼓励和支持高校自主布局基础研究，遴选一批重大原创性基础前沿科学问题和“卡脖子”关键核心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项目；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通通用科研仪器的设计研发，强化科研手段创新，打造一批支撑原始创新的科学工具；促进科教深度融合，引导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在独创新有上下功夫，努力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设计新方法、发现新现象，全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

人才梯队是推动原始创新的根本保证。对高校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支撑原始创新的核心要素。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构建有利于持续推动原始创新的人才梯次结构。一方面，要加速汇聚一批立足本土又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聚焦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痛点，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现科技创新的换道超车。另一方面，要着力培养青年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实践证明，青年时期是科学家最具创新力的黄金时段，许多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重大突破与发明，是一流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做出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能否促进青年科学家群体释放创新潜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科技竞争的胜负和民族发展的未来。高校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青年科学家的创新潜能，使其成为助推中国科技变革的先锋力量。

高质量发展是激发原始创新的现实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动选择和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必须把原始创新成果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要面向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创新链完善资金链，集中资源、形成合力，激发各类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彰显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强化原始创新成果的培育、孵化与转化，引导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对接，构建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力求将关键核心技术应用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为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科技支撑。

国际化是促成原始创新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强弱除了依赖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更取决于其能否融入世界创新体系进而发挥支撑引领作用。要充分把握科学技术的时代脉搏，以全球视野前瞻布局与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高校、政府、企业合作，从国家层面有选择地推进实体化海外联合研究中心建设，在不改变海外人才既有科研条件、生活环境前提下，迅速实现国际化人才汇聚并为我所用。强化与国外高科技研发体系的互动，借力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科技创新研发网络，将国际最新研发成果和技术融入我国原始创新体系，产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智慧”，助力国家迅速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文化氛围是孕育原始创新的深厚土壤。纵览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革新总是与人类思想的解放、文化文明的演进交织在一起。诸多带有原始创新的重大成果都扎根于独特的国情、文化和传统。要重点支持和鼓励植根中国文化沃土的原始性、独创性的学术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创新体系。要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勇于探索、崇尚创造、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把诚信作为底线和基石，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和学风建设，加大对科研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力度。探索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构建起支持创新、保护创新、鼓励创新和有利创新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贞观政要》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典籍，其内容主要记述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关于治理国家问题的一些议论和思考，内容包括国家治理中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等各个领域。它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学科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了解唐朝初年社会基本状况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一）

《贞观政要》的作者，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吴兢，为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旧唐书》中说他年轻时便“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后经魏元忠、朱敬则举荐，担任史官。除了《贞观政要》之外，吴兢还修撰或参与修撰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唐史》等，修改了《梁史》《齐史》《周史》《陈史》和《隋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崇尚简约、秉笔直书的史学家。

吴兢作《贞观政要》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为了“以史照今”“史教论劝”，《贞观政要》所作时代，处在唐朝极盛而将衰的历史时间点上，此时的唐朝社会虽然表面依然兴旺，但危机实已暗藏，吴兢敏锐地发现了唐朝内在衰退的趋势，为求唐朝长治久安而怀忧患而著此书。贞观年间的盛世与吴兢所处时代相距并不久远，文字留存十分丰富，但他认为唐太宗的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并没有得到认真总结，效法唐太宗的治国成功经验比远溯尧舜、文王要重要得多。于是，吴兢没有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链条叙述贞观之史，而是选择君道、任贤等一系列为君日常专题进行归类，其中既有较“大史”更为详实的历史资料，又有内涵丰富的政治观点和治理经验。

（二）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揭示了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大体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

卷。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君道》是全书的纲，论述为君之道，所以居全书之首。《政体》篇则揭示朝廷政治机构的运转程序和规范。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说明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指出君臣契合方可兴国之道。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揭示出君王与臣下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从不同侧面论述皇朝王位继承人问题。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以德治国问题，记录了唐太宗对仁义忠孝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政治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惻》《慎所好》《慎言语》等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人修养对于政治的重大影响。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第八卷，有《务农》《刑法》等5篇，揭示了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突出了以重农为基本国策和坚持法律的严肃性的思想。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讲军事和外交问题，也包括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谈论君王的行幸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祥瑞灾异，以及晚年问题。全书40篇，以《慎终》结束与开篇《君道》前后呼应，颇有深意，其中暗涵警示和鞭策唐玄宗励精图治之意。

（三）

从当今的治国、强国战略回观《贞观政要》，这一处于大唐兴盛时期的经典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书中以叙述为主的风格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历史、感悟历史、学习历史。细细思索可以发现，《贞观政要》重点阐述了三大战略关系，即上下战略关系、左右战略关系以及内外战略关系。这三大关系的处理使得唐太宗能够妥善解决好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人才、文德与武功之间的矛盾，三大关系系统筹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是治国策略的根骨所在。

其一，《贞观政要》中的上下战

略关系。书中讨论的治国问题是全面而细致的，但究其根本，首推上下关系。其开卷先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引用唐太宗的言论说明为君之重在于“存百姓”，不能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所以民存君存，民亡君亡、民富君富。上下关系战略解决的是国家存亡问题，在之后的各个篇章中，唐太宗一再论及前朝的教训，可见他极为重视这一战略关系，以至于对于由君王私事引起的百姓关注的事件他都谨慎处理。针对这一战略关系，《贞观政要》提出安定天下必定先正为君者自身，而正己必须清心寡欲、虚心纳谏，这是处理上下战略关系的具体方法，“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就是说治国之策最主要的战略论是要处理百姓问题，而处理百姓问题的方法论又回到了国君本身，所以，国君和百姓的上下关系本质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对于上下关系战略的重视和妥善处理，吴兢认为是太宗作为明君的关键。

其二，《贞观政要》中的左右战略关系。吴兢在书中重点讨论了国君任贤的问题，即左右战略关系问题。他将其列为君道和政体之后，可见他十分重视这一层关系。他列举唐太宗任人唯贤的事迹，强调为政得贤人辅佐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组织来说，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君王礼贤下士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历代“善治”之君的共识。书中描述了唐太宗对于人才的渴求和善待，如果说第一篇是阐述为君者应与百姓为一体，那么任贤一篇中就是强调对待人才要像对待自身一样。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不求全责备、不用自身长处衡量别人，根据能力提拔任用，不使关系远、地位低的人产生阻隔。借助众多人才的智慧增加自身的才干是唐太宗作为明君的一条重要经验，所以吴兢提到了魏征的一句话：“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贞观政要》中的左右关系战略，起于君王求谏、主动纳谏，中经群臣直言敢谏，终而达到上下通而为一的治理境界。君主好学能知一人之智有限，于是能容；君主能容则群臣无畏犯君之怒，于是能补；臣补君失则上下齐心而一致，于是能通。唐太宗爱民、能容、好学，以贤臣补自身

不足，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其三，《贞观政要》中的内外战略关系。在内外战略关系的处理上，《贞观政要》认为是内主而外宾，孜孜不倦地提高内在修养，则外来的困境自然迎刃而解。“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作者在述过为君、任贤之后，依然讨论的是为君的修养问题。全书十卷，前六卷都是在讨论正己，后四卷阐述因此而产生的政策方针部署。可见，吴兢认为，君主的自身修养是治国才能的根本，方针的制定则是由认识修养的提高而自然而然进行的实际部署。书中对唐太宗政策方针进行了概述，其中有修文、崇儒、礼治、法宽、休养生息、安民、怀柔安边等等，都是与前六章个人修养的对应，是对个人修养的扩大化。可以看出，吴兢是从儒家“内圣外王”的角度来写《贞观政要》的，认为政策与内在修养是一体的、密不可分分的。书中唐太宗认为农业是安民、治国的根本，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唐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获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贞观后期天下谷仓堆积如山，民生富足堪比盛世，吴兢认为这是唐太宗正己而治天下的成功作为所致。



“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的四维解读

晏维龙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18日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强调：“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准确解读“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这一命题所蕴含的思想逻辑，直接关系高等院校在育人实践中能否真正开好讲好思政课，笔者从四个维度对此加以理解认识。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需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提高我们党长期执政的能力，需要培养出

有信念、有理想、热爱党、忠于党、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要正视还面临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个别党组织缺乏“大思政”理念，没有建立“大思政”工作格局；其二，个别学校没有“落实好”思政课的实践，没有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发力；其三，个别教师在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缺乏活力；其四，思政课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还不够。这必然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用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培养学生，切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养一代又一代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化需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高等院校是思想文化交汇的聚集地带，也是思想观念碰撞最活跃的地方，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场所。这一现实状况迫切需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

以达到廓清思想迷雾、阐释思潮本质、还原话语真相的目的，从而为立德树人扫清思想障碍和舆论障碍。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阶段的“拔节孕穗期”，其知识体系还没有健全、价值观还没有稳定，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需要得到精心引导和尽心栽培。“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发挥高等院校思想文化阵地作用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之所以把教育的地位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是因为教育事实上是一种优秀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再生产形式，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持续传承知识和文明的重要手段。我国自古就有重视教育作用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取得了立德树人的很好成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更加接近，综合国力竞争中起着更关键作用的是“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必须依靠高水平思想教育来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需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思想政治理论课之所以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关键课程，就在于它与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政治观、审美观等等关系健康成长的诸多思想观念的形成息息相关。开好思政课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与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必须使学生在思想观念、政治品质、法制意识和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与发展要求相适应。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教育的性质由经济基础决定，也与所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我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担负历史使命。